

·文献学苑·

“买地契”的文献价值

——以绍兴图书馆“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和“建宁买地券”拓片为中心

王燕飞 (绍兴图书馆 浙江绍兴 312000)

摘 要: 买地券脱胎于契约原件,它是对买卖行为或买卖关系进行规范的一种文字记录。东汉“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和“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为绍兴地区现存土地买卖契约有确切年代的最早文物之一和金石文献,是一种从形制和内容上都具特殊意义的地方文献资料,其拓片绍兴图书馆有藏。文章从两件买地券的符号、内容及其保存的时代知识信息等方面,略述这种特殊载体形式文献的价值。

关键词: 买地券 地方文献

中图分类号: K877;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9)04-0145-05

Literature Value of Title Deed for Land

Wang Yanfei (Shaoxing Librar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Title deed for land is developed from the original copy of a contract. It is the record of a transaction so as to standardize the deal.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Daji's buying mountain land of the East Han Dynasty and The Title Deed for Land in Wufengli in Jianning are of the earliest literature of this kind in Shaoxing.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formation of the two documents and their literature value.

Key words: title deed for land; local literature

CLC number: K877;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4-0145-05

拓片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献形式,自古以来我国的公私收藏机构都很注重拓片的收集和整理。近年来,绍兴图书馆将馆藏4000余件拓片整理编目,编辑出版了《绍兴图书馆馆藏地方碑拓选》,使本馆的特藏文献形成一个便于检索利用的信息源,文献的功能得到优化和提升,图书馆的核心价值在文献的收藏和利用中得以回归。在这些拓片资料中,与古代绍兴地方事物相关的就有近400余件,是绍兴地方文献的补充。但相当部分资料因其碑文漫漶而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并且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金石已毁坏无存。东汉“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和“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两方不同载体的买地券为绍兴地区现存的土地买卖契约有确切年代的最早文物之一,其拓片为绍兴图书馆所收藏,且实物至今仍保存完好。两件买地券特有的符号、载体、知识内容及其保存的时代信息,使其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

1 两买地券形式及内容

“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位于绍兴县富盛镇乌石村

跳山东坡,岩高约5米。题刻于东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铭文阴刻,20字:“昆弟六人,共买山地,建初元年,造此冢地,直三万钱。”因碑额另竖刻有“大吉”两字,故又称“大吉碑”,亦称《建初买山地石摩崖》,它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地券刻石,更是浙江境内时代最早的摩崖,距今已1930年,被列为我国的汉刻瑰宝。“建宁五风里买地券”,砖质,长方形,砖底为平面,砖面为凹弧形,砖长15.2厘米,宽10.4厘米,高厚处3.9厘米,薄处2.1厘米。制作于东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其正面铭文阳刻,50余字:“兄弟九人,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十万,即日交毕,分置券台,合荊大吉。立右。建宁元年二月朔。有私约者当律令。”砖左侧书“建宁元年一月五风里番延寿墓”,右侧绘兰花图案。该买地券出土于诸暨市东白湖镇琴弦岗村,现藏诸暨市博物馆,距今1837年。

对于“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前人早有考证。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云:“是刻在会稽跳山,郡城东南五十里。《万历绍兴府志》云,土人传为钱武肃王微时贩盐遇官兵,跳避此山,壁上书‘大吉’字。考(跳山)山名不

见于《嘉泰会稽志》。”^[1]“癸未仲夏,余偕兄尺庄(杜煦)觅先世葬地,偶憩兹山。其石高不及二寻,迤邐围十余丈,色黝然而黑。土人云,有字在石趾,剔除苔藓谛视,乃东汉人题记,为自来金石家著录所未及者。”^[2]“隶书,凡五行,行四字,上方有大吉二字,以建初尺度之,字大六寸五分及二寸五分不等。”^[3]旁有“退思”二字,楷书,“径七八寸,不详何代所刻,当亦非唐以后者。”北端为清道光三年(1823年)杜春生偕吴荣光等《获石同观题记》一段,楷书“后一千七百四十八年道光癸未,南海吴荣光偕仁和赵魏、武进陆耀通、山阴杜煦、杜春生获石同观。”^[4]清《越中杂识》亦有“吴越武肃王书‘大吉’两字,在府城南三十里跳山石壁上”之说。^[5]但此所谓“武肃王轶事”并无依据,仅误传而已。清著名学者阮元《两浙金石志》云:“石刻近为山阴杜氏所获,盖当时买地券文也。”^[6]

“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中有“分置券台,合茆大吉”等语。茆,即契券。合茆,即指与契约相符,茆,古代将书于竹简的契约从中剖开,双方各持一半,作为凭证。而此处所言之“券台”,则为堪舆家术语,指墓前地气聚合之处,亦可指墓前祭台。此买地券中还有“五风里”、“山公”等名词。五风里,亦作五凤里,即龙泉里,为诸暨古行政区域名,以其地形似五只凤凰而命名。清《光绪诸暨县志·山水志》载:“古龙泉里……里左为五凤岭,右为磨箭坪。”^[7]“风、凤”古通,“五风”即“五凤”,今作舞凤。该“买地券”出土地点琴弦村,与古“五风里”接壤。“山公”为代表山神接受享祭者,死者所需墓地必须向“山公”购取。《后汉书·宋均传》载:“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姬”,唐李贤注:“以男为山公,以女为山姬,犹祭之有尸主也。”^[8]今诸暨仍有“山公山姆”之说。^[9]

在“建宁五风里买地券”砖体左侧所书边款“建宁元年一月五风里番延寿墓”一语中,笔者疑“番延寿”之“番”为“潘”字之别构。历史上虽亦有姓“番(音pān)”者,例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即载有“番係”,《姓氏考略》载:“《诗·小雅》:‘番维司徒’。笺:‘周幽王后族党’。番姓始此。”^[10]但此姓极为罕见。

2 买地券性质之探析

买卖券契是伴随买卖行为而出现的产物,它也是对买卖行为或买卖关系进行规范的一种文字记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现存契约原件以甘肃出土的西汉中期“居延汉代契约”最早。买地券脱胎于契约,是契约的一种。“买地券”之称,传世文献中初见于南

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买地券”条,谓:“今人造墓,必用买地券。”^[11]清代乾嘉之后,随着金石、考据之学的复兴,买地券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20世纪初,罗振玉先生开始搜集并著录买地券,成果主要集中在《贞松堂集古遗文》、《地券征存》、《蒿里遗珍》、《芒洛冢墓遗文革四编补》等著作中。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中亦有著录。对于买地券之性质,学术界一直有分歧,有学者认为是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也有学者认为是摹仿土地买卖文书制作的随葬品,究竟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事物,还是同一事物的两种具体表现形式,观点有三种:第一种以罗振玉为代表,认为一部分属于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他在《蒿里遗珍》中提出:“以传世诸券考之,殆有二种:一为买之于人,如建初、建宁二券是也;一为买之于鬼神,则术家假托之词。”^[12]在《贞松堂集古遗文》中,又将“买之于人”者视为土地买卖文书,称之为“地券”;而把买之于鬼神者,称为“镇墓券”。其主张得到我国绝大多数学者的赞同。如《战国秦汉考古》一书对“买地券”如是说:“这种地券从东汉开始常见于墓葬,用铅、玉石、木、砖等材料制成,券上文字多半是刻成的,也有刻成后填朱或直接以朱、墨写的。内容大抵是买地日期、面积、四界、价值、证人等,与当时现实生活中的买地券基本相同。”^[13]第二种是日本学者仁井田陞的意见,把几乎全部出自汉魏六朝墓中的买地券,统统称为“现实生活中的土地买卖文书”^[14]他的这一见解在日本影响很大。第三种认为是买地券均为明器。李寿冈《也谈“地券”的鉴别》一文持这一观点^[15]但少有学者支持。也有学者认为买地券分早期和晚期,早期内容基本上是摹仿实在的土地买卖文书,真实性较强,史料价值高;晚期买地券千篇一律,迷信色彩浓厚,无多大史料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吕志峰博士认为:“买地券是东汉以来随葬的一种反映土地私有及其观念的文书,是土地买卖导致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凭证。作为出土地实物文献,买地券基本保持了当时的原貌,在土地制度、经济史、语言文字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史料和研究价值。”^[16]

3 具有重要的土地史料价值

3.1 提供了东汉土地买卖的基本信息

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一般以战国中叶的“商鞅变法”、魏晋时期的“占田荫客制”和中唐“两税法”为标志,分为四个阶段,这实际上是土地所有权不断明晰化的发展过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使黔首自实田”,即在全国范围内承认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自此以后,“官田”、“公田”与“民田”、“私田”有了比较明确的区

别。但是,国家对土地产权的保护则仍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我们从司马迁《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可以看出,贵为丞相的萧何,在“贱买民田宅数千万”后,仍有恐子孙不能守而“为势家所夺”的忧虑。汉代山阴(现绍兴)县为荆王刘濞封地,实行按丁分配土地,后人称为“丁口田”,东汉时,山阴出现地主庄园,土地买卖,兼并渐盛。两方出土于绍兴地区的“买地券”无疑是实物佐证。两份买山契约均记载了买卖双方的姓名、土地位置、价格以及合同签订时间等。两者均系向“山公”买山之凭据,所买山地用途均为冢地。“买地券”还从另一个侧面表现出道教文化的影响,从中可以考见民间信仰的轮廓。“券”中所指虽为阴间之事,实际上这里的阴间是阳间的翻版,地下官吏也是地上官吏的翻版。中国古代的土地物权流转是普遍存在的,土地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比其它生产资料重要,这在封建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具有永恒性和生产性。因此,通过对土地的买卖的探究,就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古代商品经济发展状况和特点的有关信息。

3.2 提供了中国古代买地券序列的重要特征

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交换关系产生并发展,萌芽状态的契约也已产生。近千年来,许多少数民族使用契约的情况在汉族文献中也有所反映,只是这些少数民族都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所用契约都有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无文字。两汉时期,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土地买卖很盛行,作为土地私有权的证明文书——契约,被广泛使用于土地买卖的关系中。此时的契约形式因用途不同,分为三种:即《周礼·天官·小宰》所说:“听称责以傅别”、“听买卖以质剂”、“听取予以书契”^[17]就是说借贷契约用傅别,买卖契约用质剂,授予收受契约用书契。张传玺教授在研究买地券时将汉魏时期买地券设计的广例为九项,其序列为:(1)标题,券额;(2)立券时间;(3)钱主姓名;(4)业主姓名;(5)标的确定;(6)券价与交割;(7)业主担保与违约罚则;(8)中保人署名与酒礼银;(9)设神道以护法权。^[18]“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和“建宁买地券”广例设计六至九项,格式趋向固定,文字相对严谨。立契时间前者“建初元年”,后者“建宁元年”,均用了皇帝年号,反映了当时买地时间上的基本写法。一为“昆弟六人”,一为“兄弟九人”,业主姓名为第三人称写法。共买山地,造此冢地,地价“直三万钱”,“从山公买山一丘于五风里,葬父马卫将,直钱六十万”,标的非常明确。“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文义简单,字数不多,格式古朴,却反映了在封建社会里以封建宗法关系为纽带,同宗近族,生前住在一起,同

祀祖宗,死后埋在一块坟地里的宗法观念。“建宁五风里买地券”字数较多,还注明了所买山地的数量“一丘”和地理位置“五风里”。从文末“有私约者当律令”这一“合同习语”可以看出,古代民间私契已反映出“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的法律理念,说明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民事习惯法。标题、券额、立券时间、业主姓名、标的确定、券价与交割、设神道以护法权,是汉魏时期契约的大致定式。

3.3 “当律令”体现了人类自身内在文明的价值

土地契约是土地关系双方或数方当事人依法订立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协议,是法律文书,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

传统法学理论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以刑为主”的。但从“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中“有私约者当律令”这一合同习语来看,在中国古代,民间私契在当事人之间的效力等同于官府律令的效力的理念,却是由来已久了,也就是说,民间长期存在着与官府律令相对应的民事习惯法。说明中国古代对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往往是通过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以正律作为民事活动底线最基本要求的原则来实现的。古人早已明白,国家的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经济生活中的每一种行为都作出具体的规定,再庞大的法典也无法穷尽所有的法律关系。正因为此,就不得不借助于各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磨合出一个最一般的行为规则,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行为都能受到法律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这种“以正律作为一种民事活动底线”而构筑的民事法律制度,起到了法定方式所无法具备的法律调整功能,故不失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有效措施,是一种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人类文明的体现。

买地券中的“当律令”体现了契约效力的“至高无上”。“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中“有私约者当律令”字样,就是表示当事人对契约所具有的法律约束力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官府对民间私约法律效力的肯定。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规范系统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系统,是通过公权力的界定来给出私权活动的范围的。我们通过对“民有私约如律令”到“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史料考证,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民事法律调整的独到之处。关于“当律令”之谓,实际上是当时官府、民间和道教三者相互影响、彼此融合的产物。不论是声称阴间订立的契约具有同人间律令同等的效力,还是说有同天帝律令相同的威力,都是在强调契约效力的“至高无上”。显然,地券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频繁使用

的土地契约的直接临摹。地券中出现的“有私约者当律令”这句契约习语,可以被理解为“私约在立约人之间产生如同法令一样的效力”。也就是说,民间缔结的“私约”具有近乎官府制定的“公法”那样高的效力。这既是中国古代民间对契约的认识,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契约的功能、意义及重要地位的认识。

4 投射出汉隶艺术的审美价值

中国秦汉时代,是汉字变迁最为剧烈的时代:大篆经过省改而成为小篆,隶书发展成熟,草书发展成章草,行书和楷书也在萌芽,书法家也随之大量出现。文字的变化和书法的成就,对后代的书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小篆是秦代的官方文字,形体长方,用笔圆转,结构匀称,笔势瘦劲俊逸,体态典雅宽舒,主要用于官方文书、刻石、刻符等。而汉代通行的字体大致有三种:一是篆书,多用于刻石、刻符以及高级官方文书和重要仪典的书写;二是隶书,多用于中级的官方文书和经籍的书写、一般的经书和碑刻等;三是草书,多用于低级的官方文书和一般奏牋草稿。

两方“买地券”所用字体均为隶书,但既有篆书的痕迹,又有明显的汉简风格。隶书到西汉末期和东汉时期发展到成熟阶段,形体由长方趋向宽扁,由纵势转向横势,笔画已趋工整,波挑也更为完美,而点画俯仰呼应使隶书的艺术性达到和谐完美的境界。就东汉碑刻隶书而言,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字形比较方整,而法度严谨,波磔分明;一类则书写比较随意自然,法度不十分森严,有放纵不羁的趣味。文中的两方“买地券”当属于后者,“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中“初”字,左右分别为象形的“衣”和“刀”,用刀裁布正是初字的本意。该“初”字左半的“衣”为篆形,右半的“刀”为隶形,又“刀”字向左的波挑一直延伸到左半的“衣”形之下,其半篆半隶、篆隶合一的特征表现得十分浓烈。“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中的“买”、“五”字等保留有篆书的痕迹,“宁”、“令”等字却又明显保留了汉简的韵味。在技法上,东汉隶书用笔技巧更为丰富,在波挑中充分发挥笔毫的变化,提按顿挫,起笔止笔,表现出蚕头燕尾波势的特色。结构上疏密的变化,点画的呼应,更加呈现出隶书复杂多变的姿致,而风格也更为多样。两券中“竖行”间距亨匀,而“横行”则依字布局,随机谋篇。如“山地”两字及“直三”两字,仅占一个字的位置,避免了因“山”、“三”笔画过简所带来的空旷,而对于笔画过于繁复之字如“置”、“臺”、“弟”、“萬”(选用了俗体“万”)等又作适当的笔画简省,从而使整体布局更为紧凑匀

称。“大吉买地山地记刻石碑”所反映的是纯民间的买卖山地行为,这一宽松的民间环境,造就了其在总体布局上的无拘无束和朴拙真率,而无汉代石刻大多呈现出典雅的庙堂风格,从而展示出奔放流畅、伸缩自如、亦方亦圆、跌宕起伏的风格,孕育出一种极富审美艺术的天趣新姿。在我国的书法艺术发展史上,东汉正处在从秦篆向汉隶过渡的关键时期,该刻石为后人留下了这一时期的活标本。

5 折射出文字避讳及文字简化信息

人物姓氏的避讳,大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之法才初步确立,到了汉代,由于儒学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避讳制度更趋完备,避讳范围更趋宽广。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孔子在记史过程中就已明确地提出过要“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建宁五风里买地券”中的“丘”字写成缺笔(缺第四笔“竖”),是为避“孔丘”之讳。封建统治者为了表示对孔子的尊重,规定了避圣讳,凡遇“丘”字,一律缺一笔,且不得念丘,而要改读成“区”音,凡“丘”姓一律加偏旁为“邱”,并读作“期”音。地名有“丘”字者,亦须易以他名,如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改“瑕丘县”为“瑕县”、改“龚丘县”为“龚县”等。还出现了文字的简化现象如“万”的字形最早见于西周早期器物“匭万簋”,战国时期的古印中亦有以“万”字用作“萬”字者,在汉印、汉碑及魏碑中,更多将“萬”写作“万”。另一风俗习惯是,在当地民间书法中,亦有“阴阳之别”。同是“吉”字,用于“阴间”时,多用“从土从口”而作“吉”字,如言“风水”好的坟地为“吉穴”,墓碑上有时也会写上“大吉”“吉安”等字样;而对于“人间(阳间)”,则需用“从土从口”而作“吉”,如言“吉利”“吉祥”等,民间至今仍有此说。

6 反映出古代砖质地券制作工艺

从发现的汉代买地券来看,有玉券、铅券、砖券、木券等,而砖券则是代表性的一种。汉代砖券的制作工艺我们可从“建宁五风里买地券”见一斑。从该砖质凸出的“阳文”文字和图案来看,应是采用“模范”制作而成。模范,俗称模子,制造器物模型。制作时,先在模子上阴刻文字或图案,然后填以砖泥而成型,最后烧制成砖。所以需在模范上先阴刻成“反体”文字,这样翻制出的券砖才成“正体”。从砖上边款中“风”、“墓”两字看,显

系“反体”不够规范,所以砖上翻制出的“风”、“墓”字阳文却类似“反体”。砖右侧绘制有草形图案,观其状极类今浙江省省花、绍兴市市花兰花,如是,则可谓为目前所见绍兴最早之兰花图。

参考文献:

- [1](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96.
- [2]高军.绍兴文物精华[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136.
- [3](清)陈声.光绪诸暨县志.上海书店据宣统2年(1910年)刻本影印,1993年6月.
- [4]任桂全.绍兴市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2208.
- [5](清)西吴悔堂老人.越中杂识[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184.
- [6](清)阮元.两浙金石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471.
- [7](清)陈声.光绪诸暨县志[M].上海:上海书店,影印本,1993:1.
- [8]后汉书[A].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7:10.

- [9]杨士安.诸暨散论·诸暨五凤里马氏买地券[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50.
- [10]臧励和.中国人名大辞典[Z].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56.
- [11](宋)周密.癸辛杂识[A].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41.
- [12]罗振玉.蒿里遗珍[M].杭州:浙江富阳华宝斋影印本,2007:2.
- [13]查瑞珍.战国秦汉考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232.
- [14][16]吕志峰.东汉买地券著录与研究概述[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2003(2).
- [15]李寿冈.也谈“地券”的鉴别[J].文物,1978(2).
- [17](宋)朱申.周礼句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112.
- [18]张传玺.契约史买地券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8:174.

作者简介:王燕飞(1961-),女,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古籍整理开发。

(上接第144页) 相同。而魏晋以后,“六义”一分为二,《诗品·序》即初步显示了当时人们的看法。时代越往后,人们的认识越清晰。至唐宋时期,人们为“六义”作出明确解说。按照孔颖达为代表的唐代学者的观点,风雅颂所含内容大体相类,而赋比兴所含内容大体相类,前者是就诗的篇章结构而言,后者是就诗的遣词造句特点与创作手法而言;前者为诗之体,后者为诗之用。元代人杨载的看法与此相同,他认为,前者指体裁,后者指方法。体裁是固定的、恒常的,而方法则是灵活的、可变的。因此南宋的林景熙将前者指喻为“经”,而将后者指喻为“纬”。我们知道,恒常之事易掌握,而可变之事难把玩。更重要的是,诗歌与一般文章在体裁上区别明显,而创作方法却复杂活变,不易为一般人理解。说到底,诗歌的文学性与审美特征固然要靠体裁得到反映,但它更要依赖创作技巧与方法得以体现。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赋比兴。

《诗品》的研究对象是五言诗,所以说该作在诗歌体裁辨析方面,不存在任何异议。钟嵘研究的目的,自然就集中在了诗歌的创作方式与审美特征上。据此判断五言诗的高下,无疑是《诗品》主要的特色。如此看来,在我们讨论的这组异文里,“诗有三义”是合理的。钟嵘继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第三十六)之后,进一步对“赋比兴”作了更为系统的论述。

钟嵘还把传统的“赋比兴”排序改为“兴比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可见，钟嵘不仅提升了“兴”在“三义”中的地位，他还对“兴”作出了超乎前人的解释。这意味着钟嵘对五言诗的关注，已经超越技法，更趋审美。他所说的“兴”，或对唐代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宋代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意境之说，不无启示。

参考文献:

- [1]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39-540.
- [2]章学诚.文史通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5:876.
- [3][9]曹旭.钟嵘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195.
- [4][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68-69.
- [6]周予同.中国历史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40.
- [7]许道勋.论经史关系的演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2).
- [8]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M].成都:成都古籍出版社,1983:36.

作者简介:辛晓玲(1967-),女,长安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研究人员,研究方向:文艺理论。